

近代中日启示录

王晓秋

北京出版社

近代中日启示录

王 晓 秋

北 京 出 版 社

近代中日启示录

Jin Dai Zhong Ri Qi Shi Lu

王 晓 秋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马 池 口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48,000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

ISBN 7—200—00206—2/K·22

书号: 11071·495 定价: 2.30元

序 言

人们常说：读史使人明智，比较有助于鉴别。当我们考察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历史，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对比两国发展道路的时候，一定会发现：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近代中日关系，是那么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两个国家能象中国与日本那样，相互交往的历史如此悠久，相互影响如此广泛深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中日关系对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变化，以至国家民族的兴衰，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又是怎样在各个不同历史事件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呢？

世界上恐怕也很难找到两个国家能象中国与日本那样，在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上，起步时的处境这样相似，结局却又是如此不同。十九世纪中叶，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冲击下，闭关的中国、锁国的日本都被敲开大门，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可以说，在近代历史的开端，中日两国基本上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不到三十年，日本就不失时机地、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中国却迟至十九世纪末才进行以失败告终的戊戌变法。历史无情地宣告：日本已经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而中国却仍然在半殖民地深渊中苦苦挣扎，甚至濒临被瓜分的危机。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两国维新成败悬殊的原因又在哪里？

在一千多年中日古代交流史上，日本一直是甘当小学生，恭恭敬敬地向中国学习。一批批遣唐使带回了中国的经济文化成

果，朝野上下竭力模仿中国的制度、习俗。但是，曾几何时，进入近代仅仅几十年，形势就发生了逆转，先生变成了学生，徒弟当上了师傅。十九世纪末，中国维新派喊出了“以日本为师”的口号，迫不及待地向日本取经，亦步亦趋地仿行变法。二十世纪初，更有成千上万中国青年东渡留学，如饥似渴地吸收日本的新思想、新文化。这种戏剧性的变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国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个转变，如何向日本学习的呢？

在古代，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和睦相处的邻邦，留下了许多友好往来的动人佳话。然而到了近代，尤其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却充当了侵略中国的重要角色，发动了一次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痛苦。而就在两国关系恶化的年代，日本的进步人士也在维护中日友谊，支持中国革命。中日近代交往的历史又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教训呢？

不能让历史的长河白白流逝，我们应该回顾、思考、研究、分析，从这段充满曲折与迷离、耻辱和失败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转化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精神力量。历史也是最好的见证，只有阐明近代中日关系的真相，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中日之间的友好交流。

鉴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这种重要性和迫切性，笔者写了这部以探讨近代时期中日两国之间相互影响为中心的研究著作——《近代中日启示录》，力图以大量中日文史料，叙述活生生的历史过程，并加以一定的具体分析，尽量避免空泛的议论，而让历史事实本身给读者以启迪。

《近代中日启示录》全书共分十章。前六章分别考察了近代时期在中国和日本发生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和影响。例如中国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及其相互联系，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中国的重

大影响。并对中日两国的闭关、开放、维新、革命等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比较研究。本书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侵华言行的同时，还歌颂了日本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声援，用事实说明中日两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是互相支持的，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愿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笔者近几年来在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见到了大量的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著作和访问游记，本书的后四章对其有选择地做了介绍和分析。其中包括堪称中国研究日本代表作的《日本国志》和长期珍藏宫中、鲜为人知的《日本变政考》，以及一批珍贵的日本游记。这些书籍记载了近代中国人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和对日本的各种看法，生动有趣地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近代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这些前人的见解，至今读来仍颇有启发。为了便于读者对照和查考，本书最后还附有详细的《近代中日历史对照大事年表》。

这部书只是笔者这些年来从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部分成果和心得，有的还比较粗糙，有的尚属初步探索，写出来是为了抛砖引玉，希望能得到中日两国学者的批评与指教。其中若干内容，曾经在国内《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发表过，这次纳入本书时，又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教授和已故的陈庆华教授的鼓励指导。日本东京大学小岛晋治教授、东京女子大学山根幸夫教授、关西大学大庭修教授等日本学者也曾热心提供资料。本书还参考了不少中日学者的著作和论文。此外，北京出版社的同志们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晓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于北京大学燕园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鸦片战争与日本1

(一) 无独有偶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日本：闭关与锁国1

(二) 阿片风说

——日本人关于鸦片战争的情报8

(三) 海外新话

——日本人对鸦片战争的描述13

(四) 天赐前鉴

——日本人对鸦片战争的认识17

(五) 有用之书

——《海国图志》等书对日本的影响24

(六) 开国异同

——中日两国开国之间的关系和比较37

第二章 太平天国与日本45

(一) 情报来源

——日本人如何了解太平天国45

(二) 江戸军谈

——日本人对太平天国的认识57

(三) 推动维新

——太平天国革命对日本的影响63

(四) 亦必出巧

——洪仁玕的预言67

第三章 明治维新与中国	69
(一) 最初的反应	
——“攻日论”及其反对者	69
(二) 一场舌战	
——李鸿章与森有礼的辩论	73
(三) 走马看花	
——早期日本游记评明治维新	75
(四) 深入考察	
——黄遵宪等人对明治维新的研究	79
(五) 众说纷纭	
——甲午战争前中国人的明治维新观	82
第四章 戊戌维新与日本	85
(一) 以强敌为师	
——甲午战争与维新派的日本观	85
(二) 亦步亦趋	
——百日维新与日本	91
(三) 醉翁之意	
——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	98
(四) 议论纷纷	
——日本舆论对戊戌维新的反应	106
(五) 政变之后	
——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	110
(六) 成败得失	
——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比较	118
第五章 义和团运动与日本	130
(一) 趁火打劫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野心	130
(二) 煽风点火	
——日本资产阶级报刊的言论	135
(三) 正义的呼声	

——日本进步人士对义和团运动的声援	138
第六章 辛亥革命与日本	145
(一) 东海惊雷	
——辛亥革命震动了日本	145
(二) 仇视与干涉	
——日本统治集团的态度	148
(三) 同情与支持	
——日本进步人士的反应	153
(四) 雨后春笋	
——日本研究中国问题团体的兴起	155
(五) 连锁反应	
——护宪运动与大正政变	159
第七章 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代表作	
——黄遵宪《日本国志》研究	165
(一) 呕心沥血之作	
——《日本国志》的写作过程	165
(二) 为变法作借鉴	
——《日本国志》的内容和特色	172
(三) 海内奉为瑰宝	
——《日本国志》的意义和影响	185
第八章 近代中国仿效日本变法的蓝图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研究	192
(一) 宫中珍本	
——故宫藏《日本变政考》进呈本考证	192
(二) 昼夜编呈	
——《日本变政考》编写与进呈的经过	194
(三) 仿日本改制	
——《日本变政考》内容分析	198
(四) 以君权雷厉风行	
——重评康有为的戊戌议会观	205

第九章 近代中日交流的实录

——近代日本游记研究札记（上）	211
（一）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日本游记	
——罗森《日本日记》	211
（二）首任驻日公使上任记	
——何如璋《使东述略》	214
（三）明治初年日本侦察记	
——王之春《谈瀛录》	218
（四）日本新政的批评者	
——李筱圃《日本纪游》	220
（五）勤奋的游历使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	222
第十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近代日本游记研究札记（下）	225
（一）但师彼之法，而不师彼之意	
——黄庆澄《东游日记》	226
（二）富国必以振兴商务为本	
——刘学洵《游历日本考察商务日记》	229
（三）冰寒青胜，前事可师	
——罗振玉《扶桑两月记》	231
（四）我为中原学稼来	
——黄璟《游历日本考察农务日记》	233
（五）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则退	
——张謇《东游日记》	235
（六）师彼所长，去我所短	
——盛宣怀《愚斋东游日记》	237
附录：近代中日历史对照大事年表（1840—1919）	242

第一章 鸦片战争与日本

十九世纪中叶是东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远涉重洋，驶来舰队，架起大炮，对准东方尚未被卷入世界市场的封建古国猛轰。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终于敲开了中华帝国闭关的大门。此后，列强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被载入史册。不久，西方军舰又向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叩关。一八五四年，美国舰队用武力强迫日本开国，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二百多年的锁国状态也被打破。接着，又发生了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此同时，日本也被迫签订一连串的“安政条约”。至此，中日两国的门户都被打开，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正如马克思在一八五八年所指出的：因为地球是圆的，“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建立世界的过程“看来已完成了。”^①对于两国的开国过程，历史学家已经做了不少研究，还是让我们看看两国开国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吧。

（一）无 独 有 偶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日本：闭关与锁国

中国与日本，都位于亚洲的东部。两国之间一海相隔，是“一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318页。

衣带水”、“一苇可航”的邻邦。中日两国均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和日本都处于封建社会晚期，而且同样遭到了西方殖民者的觊觎和骚扰。在对外关系方面，两国政府又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闭门自守的政策。

一六〇三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建立了德川幕府（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又称为江户时代）。幕府掌握着日本的统治实权，天皇只不过是个傀儡。从一六三三年至一六四一年，德川幕府接连多次发布“锁国令”，形成了一套越来越严密的锁国体制。

就在日本开始实行锁国之时，中国发生了改朝换代。一六四四年，清军从东北入关，攻占北京，建立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清初，清政府曾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到一七五七年，又关闭江苏、浙江、福建三处海关，只留下广东省的广州一口对外贸易，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具体的闭关政策。

对于中日两国的“闭关”、“锁国”政策，我们可以做一番具体的比较。

日本德川幕府在一六三三年（日本宽永十年）发布的《锁国令》中规定：“除特许船以外，严禁其他船只驶往外国。”同时规定：“除特许船以外，不得派遣日本人至外国。如有偷渡，应处死罪。偷渡船及其船主，一并扣留。”甚至旅居海外的日本人，“若返抵日本，应即处以死罪。”^①另外，条文中还包括防止耶稣教在日本蔓延、禁止官吏在长崎码头直接购买外国货物等内容。一六三四年（宽永十一年），张贴在长崎港口的告示明确宣布：“一、禁止耶稣教士进入日本；二、禁止将日本武器运往外国；三、除特许船以外，禁止日本人渡海前往外国。”^②一六三六年（宽永十三年），幕府颁布的禁令中进一步废除特许，严禁派遣任何日本船和日本人前往国外。一六三九年（宽永十六年），还下令禁止葡萄

①、② 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10页，11页。

牙船来日本。一六四一年（宽永十八年）发布的《锁国令》，又将荷兰人的商馆由平户迁到出岛，还禁止“有害的洋书”进口，连在海上遇难漂泊异国的日本人也不准回国。

德川幕府在断绝一般外交活动和对外贸易的同时，仍保留了与中国、荷兰、朝鲜，琉球四国的严格限制的贸易关系。同朝鲜、琉球的贸易交往分别通过对马藩和萨摩藩进行。中国、荷兰的商人只准在长崎一港贸易，并分别限于在长崎唐馆和出岛荷兰商馆内活动，对进港商船数与贸易额也有具体规定。

中国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也是逐步形成的。一六七二年（康熙十一年），清政府实行海禁，曾下令“片板不准下海”，“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盖房居住耕种田地者，皆拿问治罪。”^①虽然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曾宣布解除海禁，允许外商到广东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苏云台山四港通商，但到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又关闭了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关，仅留广州一口与外国贸易。清政府还在广州建立了“公行制度”，外商对华贸易必须经过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又先后颁布了《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条规，对外商在华活动加以种种限制。在广州的外商必须住在指定的夷馆之内，由行商负责管束。禁止外商偷运武器、私雇买办，甚至不许外商坐轿和在广州过冬。此外，清政府也禁止粮食、五金、硝磺、地图等物品出口，还严格控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与出海贸易。

从中国和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内容来看，在禁止本国入出航海外、限制外国商人在本国的贸易与活动以及由政府垄断和控制对外贸易等方面，两国的措施大致相似。所不同的是，中国虽然“闭关”，但并不拒绝与各国交往，只是强调对方必须承认中华帝国为“天朝上国”，追求名义上的藩属、朝贡关系，重视名分、礼仪等细节；而日本则严格限制对外交往、贸易的国别，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〇。

坚守“通信（有国书、信使来往）限于朝鲜、琉球，通商（单纯贸易）则限于中国、荷兰，其他一概拒绝”这样一条锁国的定制。同时，日本政府还特别强调严禁天主教传入。

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目的和原因来看，中日两国封建政府除了防范西方殖民者的海盗骚扰外，主要还是害怕本国人民与外来势力相接触，以致危及自己的统治。清政府和德川幕府竭力用闭关的城墙和锁国的铁链把本国人民与外界隔离开来。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推动这个新的王朝（指清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指满族）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①而且认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②。清王朝的海禁政策最初是为了镇压以台湾为基地的郑成功反清势力，日本德川幕府锁国的动机之一乃是针对国内天主教徒的反抗。尤其是一六三七年（宽永十四年）爆发了天主教徒在岛原、天草的大起义后，德川幕府更加迫不及待地加紧完成锁国体制。幕府不仅下令严禁天主教传入，停止与天主教国家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通商贸易，而且还禁止有关天主教的书籍入境，甚至别出心裁地规定，外商在长崎登陆必须经过“踏绘”（即践踏绘有圣母玛利亚像的铜板），以考验其是不是天主教徒。另外，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还包含“强本弱末”的意图，即加强中央幕府的实力，由幕府垄断并直接控制对外贸易和外国情报，以避免地方各藩通过海外交往、走私贸易与进口武器等方式扩充势力。

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日两国能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有其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是其经济基础。在中国清朝统治者的眼里，对外贸易不过是对外国人的—种恩赐。最典型的表现是乾隆皇帝—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

①、②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6—7页，3页。

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书。乾隆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帛，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①在同样是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日本也有类似的思想。早在一六六三年（宽文三年），山鹿素行就说：“以我天下之富、土地之广，不需仰赖外夷之物即可自足。”^②直到一八五九年（安政六年），日本幕府负责外国事务的官员还对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说：“多少年来，我们与外部世界没有来往，也为我们自己生产了一切必需品。”^③自然，比起地大物博的中国来说，日本对外的需求更多些，因此德川幕府不得不保留了对中国与荷兰的贸易渠道。

中日两国封建统治者的妄自尊大心理是闭关锁国政策的思想基础。长期以来，清王朝统治集团总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而别的国家都是“夷狄蛮貊”，都应该向自己朝拜进贡。乾隆皇帝给英王的敕书中就说：“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而把英使来华当作朝贡，宣布：“朕於入贡诸邦，诚心向化者，无不加之体卹，用示怀柔。”^④清代乾隆年间修的《皇朝文献通考》对世界的描述是：“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⑤在乾隆和嘉庆年间所修的两部《大清会典》中，竟把西方各国，包括英国、荷兰、意大利、葡萄牙等都算作自己的“朝贡国”，形成一种所谓“华夷秩序”的观念。日本封建统治者也有类似的思想。山鹿素行就称日本为“中央之国”，“本朝当天之正道，得地之中枢。”他还认为：“虽然四海广大而国家众多，但无堪与本朝相比之国土，即使大

①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三五。

② 山鹿素行：《山鹿语类》。

③ 阿礼国：《大君之都·幕末日本旅日记》上册，412页。

④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三五。

⑤ 《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三，四裔考一。

唐，亦不如本朝之完美。”^① 水户藩士会泽正志斋在一八二五年也宣称：“神州（指日本）是日出和元气肇始的地方。天日的后裔，历代君临，万古不易。真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纪纲。”^② 这是又一种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观念。

日本统治者还把日本是一个四周临海的岛国，作为实行锁国政策的重要条件。由于日本自古以来很少受到外敌入侵，仅有的一次元军大举渡海征日，也因遭风暴而全军覆没，更增强了日本统治者锁国自守的信心。故而山鹿素行自豪地说，与中国同“四夷相连”的地理环境不同，“中央之国”（指日本）“屹立巨海，疆域自有天险，自神圣继天立极以来，四夷终亦不得窥伺藩篱。皇统连绵而与天地共无穷。”^③

闭关与锁国是中日两国封建统治者采取的一种消极保守的对外政策，它人为地把本国自我封闭，与世界隔绝开来。它阻碍了中日两国对外贸易和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抑制了航海事业、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堵塞了观察世界、学习各国先进科学技术的渠道，禁锢了两国人民的眼界和思想，扼杀了人民的创造力和进取心，以至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这二百多年间，造成了东亚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上的停滞和落后，与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而飞跃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差距越拉越大。

当然，也应该看到，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与日本走私、骚扰活动的日趋频繁，闭关锁国政策也成为两国政府对付西方海盗商人不法行为的一种简单自卫手段。可是，在航海交通和军事技术日益进步的时代，单靠城墙和大海，已经难于阻挡驾着炮舰横行四海、用剑与火疯狂寻找市场和殖民地的西方侵略者了。日本原来所依仗的四面环海的地理优势也逐渐不起作用，甚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51页。

② 会泽正志斋：《新论》，引自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一卷，97页。

③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51页。

至转化为不利因素。十八世纪末，日本仙台藩士林子平在他的著作《海国兵谈》中，曾一针见血地点破这一点。他说：“仔细想来，从江户之日本桥至中国、荷兰，乃无边界可分之水路。”“正由于是海国，即使本非来我国之船只，由于乘船者灵机一动，亦会轻易到来。”^①幕末著名维新志士吉田松阴也尖锐地批判锁国之危害与无用。他形象地指出：“锁国犹如一人被围，须留意前后，注视左右，昼夜不得安寝，每每终于气力松懈，而遭俘获。一时之战略虽可应付，然就长远而言，若始终仅仅竭尽财力于海岸之防守，则可致国贫民穷。大敌来犯时，其结果亦将与一人之被围者同。”^②

闭关锁国政策也没有能帮助两国封建统治者建立永久稳固的统治。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和日本早已不是一片安定的绿洲，不仅面临外患的危险，而且国内也蕴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庞大的清帝国，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鼎盛之世，从嘉庆、道光朝起逐渐走向衰败。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一八一七年（嘉庆二十二年），天理教起义军甚至打进了皇宫禁苑。清王朝国势江河日下，西方资本主义则乘虚而入。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日本也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动荡和危机，突出表现为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逐渐瓦解，农民与城市贫民的起义此起彼伏，幕府统治力量也日益削弱，地方强藩离心倾向增强，大名武士不满情绪日趋高涨，封建幕藩体制正处于崩溃前夕。

中日两国的开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闭关大门，同时也给仍在锁国状态下沉睡的日本敲响了警钟，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① 林子平：《海国兵谈》，引自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76页。

② 吉田松阴：《续愚论》，《吉田松阴全集》第四卷，117页。